

# 從東北到臺灣

陳嘉驥

## 我在中央社的採訪和編輯生涯

### 由東北調南京總社

我在中央社瀋陽分社擔任外勤記者期間，每天採訪歸來，把新聞稿子寫好之後，分社主任律鴻起總喜歡與我們閒談一番。

其中談得最多的，就是律主任在天津南開大畢業後加入中央社的經過，以及抗戰時期，他在大武漢撤退、長沙大捷，隨遠征軍到印度、緬甸等地採訪情形。其中律主任最得意的一段是：抗戰勝利後，他與空軍張廷孟將軍，首先飛抵臺灣，在日本臺灣總督府會見總督安藤利吉那一幕。

律主任隨同張廷孟在瘡痍滿目的松山機場着陸，指名要見安藤利吉，日本人摸不清來路，誠惶誠恐的陪着 he 到了總督府。安藤利吉一看到律主任任衣美軍制服（盟軍發給戰地記者的制服），立刻神色緊張，不知所措的行了最敬禮。當律主任表明了身分，安藤神色才緩和過來。談到此處，他的結語總是：由此看來日本人怕的是美國人，對我們中國人還是面服心不服；要想讓日本人心服，我們中國人還得好好努力一番。

四十年前往事，歷歷如繪，回憶起來更是令人不勝今昔之感，而今筆者已年逾花甲矣！

談話的結尾，律主任多半是：你們要好好的幹，將來我可以介紹你們到總社工作。一般而言，在中央社工作，如不經過在總社洗禮，從頭到尾都在分社，那就很難有調遷的機會，當然也有例外，可是這種例外很少。因此，大家對調總社的鼓勵，最初當然抱有一些希望，但久而久之，對中央社的組織結構漸漸有所瞭解後，知道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心中也就淡然了。

### 瀋陽圍城枵腹從公

民國卅六年底與卅七年初，東北的局勢日非，東北國軍以瀋陽、長春、錦州三大城市為據點，與林彪十萬大軍鏖戰於白山黑水大地。這三大城市，當時已不能互相由地面直接聯繫，僅賴空運勉強支應，維持着局勢而已。一般老百姓如想坐飛機離開東北，每天只有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空運物資補給的回程飛機，自瀋陽直飛北平。但這僅限於瀋陽而言，長春與錦州連飛機也沒有，從瀋陽到北平的飛機票價，僅流通券數萬元，但須

在票價之外，另付四十兩黃金，就是另付黃金也非人人可得，還須有熟人才辦得到。

這時，母親自家中來信說：關外局勢險惡，你一人在瀋陽，實在令我放心不下，不知道有什麼打算沒有，是否應在北平、天津另覓工作。我回信表示：東北局勢誠然大不如前，但還不致馬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況且在這種情況下說走就走，對中央社與律主任而言，也有點不好意思，兒自有打算，請母親放心好了。所謂「自有打算」，不過是一句安慰老母的空話，有什麼打算？什麼打算也沒有！

不久，瀋陽就面臨圍城的局面，四周雖然還有撫順、瀋陽、本溪、鐵嶺、遼中、新民等六個縣，但食糧、蔬菜等物資皆遭封鎖，市區物價飛漲，瀋陽分社的伙食改吃高粱米與鹹蘿蔔，因為沒有油，吃過飯不久就又餓了。同時，由於沒有煤炭，暖氣停用，每天到了晚上睡覺時又冷又餓，凍得把全身僵硬成一團，頭也蒙在被窩裡。後來，每天晚飯時，大家湊幾個錢，買一點豬頭肥肉來，俾能多填半碗高粱米，可是這樣又把胃脹得痛，痛得睡不着覺，起來打嗝。有一天，實

在覺得內臟空虛，四肢無力，我和同事坐火車跑了一趟新民，在那裡吃了一頓牛肉餛飩，回來時頓覺渾身勁頭倍足。有過這一段的經驗，所以我今天處在物阜民豐的社會裡，總是對任何物品不肯有一點浪費，對兒女更是教導他們，絕不可以有奢侈的習慣。

幸而行政院在這時爲了改善全國公教人員生活，每月薪水按物價指數調整，在東北中央社係少數列爲中央機構之一，經費係由總社按月匯來。因此我每月待遇由每月流通券六萬元，一下子跳到了二十幾萬；而一些地方機構，係自籌經費的關係，低級職員們不過三萬元，馬毅辦的東北民報總編輯張先生，每個月才流通券五萬元。當時東北人民生活的困苦與待遇差別之大，可想而知。

嗣東北當局爲了打破林彪對瀋陽地區的封鎖，舉辦了一次用棉布、舊衣等，向封鎖區以外換取食糧的行動。這個行動，果然發生了許多效果，紓解了民間食的問題；同時，政府又由中央航空公司每天運麵粉、食米、物資以供軍公教之用。這時瀋陽市區的飯館，有的恢復了營業，東西雖然貴，可是花錢總可買得到，但是半年以前那種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 立委選舉助選拉票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六日，律主任突然表示，要介紹筆者至總社任職。這本是認爲不大可能的事，忽然間就要變爲事實，心中的高興，真是難

以形容，但是對律主任這項突然舉動，有點摸不清頭腦，究竟是爲什麼原因，以迄今日數十年已過，仍是一個謎。

爲了瀋陽分社的工作，律主任根本不應該這時讓我走；因爲我與東北軍政界領袖都相當熟悉，留我在他身邊方便的多。如說兩年相處關係良好，應該對我有些鼓勵的話，這時分社的編輯組長、採訪組長兩個缺都空着，如果給我一個組長名義，那已經是令人喜出望外了。再者如果說是爲了東北大局逆轉，先給我安排出路，在當時情形而言的確太早。因爲這時瀋陽有三十萬大軍，而東北兵工廠的武器生產足可供應，倘不是卅七年十月間東北當局的行動，錯誤加上錯誤，再加上錯誤，瀋陽根本無淪陷可能，起碼可支持兩年；東北的失敗才加速了全國的失敗。

惟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在當時政府爲了實施憲政，選舉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中央社總社支持總編輯陳博生出來競選新聞團體的立法委員。陳總編輯先後數次來電拜託律主任在瀋陽新聞團體中予以支持。律主任心想，以他在瀋陽的聲望，支持陳總編輯競選那還成什麼問題，所以向各報首長招呼一聲，就認爲什麼事也沒有了。殊不知，在投票前一天晚上，東北前鋒報發行人馬愚忱來了一個電話說：「鴻起呀，明天選舉的事要當心喲！申報總編輯陳訓念也競選新聞團體立法委員。」

今天他由申報駐瀋陽特派員韓清濤出面宴請東北前鋒報所有會員，要求明天支持他，聽說韓清濤這半個月來，天天在鹿鳴春、明湖春大飯店

等地秘密請客，我今天才知道，你們中央社當然被蒙在鼓裡，更不知道了。」

馬愚忱這通電話，對律主任而言，等於是一記悶雷貫頂，因爲他已向陳總編輯打了「包票」；第二天的選舉，不用說全軍盡沒，就是與陳訓念來個對半分，也沒有面子，難道一個瀋陽分社竟然競爭不過申報一個特派記者？

可是，這時的時間已經深夜十一時左右，明天八點鐘就開始投票，所以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了。律主任與馬愚忱通過電話後，低着頭一聲不響的下了樓梯，我想這一夜他會無法入眠。第二天早晨起來，我預備先去投票，然後再至剿總去採訪新聞，到了投票所恰好碰到來投票的都是我天天在一起跑新聞的朋友。我靈機一動，來了個當場拉票，這些朋友們真够意思，他們把韓清濤的請客與老闊的囑咐，全當成耳邊風，一律把票投給了中央社的陳博生。來了一批又一批，我皆如法炮製，並且全部成功，前前後後拉了三十多張票。

在那個時代，東北新聞界把「記者」解釋的範圍很狹窄，記者公會會員全都是編採人員，其他行政人員一概沒有；因此整個瀋陽市記者公會，不過百人左右。當天投票者，除了中央社本身會員外，我拉了三十多張，律主任臨時打電話拜託了十幾張，湊湊弄弄，一共得了六十多張票，而陳訓念只得了三十多張票。選舉結果一揭曉，韓清濤大呼，這裡頭一定有鬼，你們連客都沒請，怎麼會有這麼多張票。在當年根本沒有什麼選舉法，如在今日，我的現場拉票說不定要吃選舉

官司了。

## 外勤人擠改做編輯

我匆匆忙忙的離開瀋陽，在北平、天津只待了兩天，民國卅七年三月九日，便到了首都南京。律主任介紹我至總社工作，事先總社並不知情。我不過拿着律主任給蕭社長同效、曹秘書蔭輝、陳總編輯博生三封信。到了總社，首先晉見了總編輯陳博生，其次是晉見秘書曹蔭輝，他們兩人看了律主任的介紹信，都很客氣的表示，進總社沒有問題，等見了蕭社長以後再說。當天因為蕭社長不在南京去了上海，我將律主任介紹信交給了秘書室轉呈。

過了幾天，秘書室通知說，社長已經回來了，並決定三月十六日上午十點鐘，在社長辦公室接見你。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對我而言，這也是此生的一個重要日子，這一天使我遠離我曾對之狂熱的外勤記者採訪生活，注定了要做一輩子編輯生涯。我看到了蕭社長，他那瀟灑秀逸的丰姿，較我在瀋陽時聽自律主任所描繪的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蕭先生首先詢問了些東北局勢與瀋陽分社的近況後，話題才轉到我要調到總社擔任記者的問題。他說：「你在東北表現的不錯，不過一個好的新聞全才，並不是只會採訪，也必須是一個好編輯，作了編輯更能充實自己。」聽了蕭先生這幾句話，我心中已意會到大事不妙，就在此時蕭先生轉頭望了望我，他又說：「現在總社採訪部房間很小，大家擠得滿滿的，還有人沒有座位，

所以無法再容納新人進去，你是否願意到編輯部去工作？」當年才廿七歲的我，竟毫不考慮的回答：我還是喜歡到採訪部去，對編輯工作沒有什麼興趣。蕭先生對我的率直拒絕，好像是並無不悅之色，祇說我與總編輯商量商量再決定，從此一等便是十幾天，我的工作問題竟然沒有了下文。

到了四月我才着了急，寫信向律主任報告，律主任回信說，事已至此，目前有三條路由你選擇。第一：我寄來一封給編輯部副主任沈宗琳的信，由他替你進行就進編輯部好了。第二，你可以到北平進華北日報當記者，由我與令兄雙方進行，大概沒有問題。第三，回到瀋陽。不過我想這三條路還是第一條留在南京總社最好，進編輯部就進編輯部吧！編輯部主任唐際清先生是我南開同學，他人很好。

我於是決定進入編輯部，見到了沈副主任，把律主任信呈給了他，第三天他便告訴我：「你進編輯部事已經辦好，社長已經批了，過一兩天就可以上班，不過有一點你要注意，進了編輯部就得心安工作，如果想調採訪部並不容易啊！」我於是進了編輯部作了助理編輯，從此便與外勤工作絕了緣。

其後，民國四十年，我經中央社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的介紹，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及特派員馮志翔，希望我進入香港時報作記者。我去了兩天，一來是覺得做慣了中央社記者，寫一篇特稿有好幾十家報紙登出，而現在寫稿僅在一家報館登出，實在沒意思。我在瀋陽時寫的白山黑水

間兒女們、東北國防線、東北的延安——佳木斯、旅順大連今昔、四平街大會戰、鴨綠江水豐電廠等稿件，不但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瀋陽、長春等地接近滿堂紅，遠在西安、重慶、迪化、昆明等地，也一律上了報。另一方面是我一看當時香港時報在館前街的辦公處，給我住的宿舍，竟然是一間密不通風，連一個窗戶也沒有黑房間；我最怕熱，心想住在這裡如何受得了，於是打了退堂鼓，從此我才真的與記者這個名字絕了緣。

在我之後進香港時報的是陳博生的公子陳體立、于衡、張繼高，除了陳體立已病故外，其他兩位均是今日新聞界小名人了。

## 看海茫茫失落佳人

我進總社當記者願望成空，在等消息這段期間，我每天無聊得很，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我對南京滿目生疏，除了早我幾個從瀋陽調至南京總社採訪部的齊振一兄外，可以說：「既無親，又無故」，對名勝古蹟，亦因工作尚無着落，也難得有興趣去遊賞，每天多半是到總社坐在採訪部去等消息。三月的天氣，那時在南京仍然很冷，多半都還穿着大衣，我每天走進採訪部之後，便把大衣脫下，掛在門的後邊。

在離開瀋陽時，除了當月的薪水外，律主任多給了一個月薪水，連同我手頭原有的，總共有七十萬左右流通券。流通券與法幣的匯率，雖然官價規定一比十三，但由於東北地區局勢日非，因此黑市的匯率已降到一比八左右而已。如果你

想按官定比率去兌換，不但費時費事，除了應有手續外，還有許多限制，可以說根本辦不到。我自瀋陽到北平後，手拿着七十萬流通券，正在街上找銀號去換法幣時，恰巧碰到中國紡織公司東北分公司經理桂秀垣。自從東北局勢緊張後，我就未曾再看到他，一晃已有半年多，在北平街頭相值，他表現得非常親熱。桂季垣說，你把流通券交給我，你不是今天還要回天津嗎？那麼咱們明天中午在同和居見面，到南京飛機票我叫人替你買。我回到天津，本來可多住兩天，可是因為第二天要見桂季垣拿法幣，所以在天津只住了一夜，便匆匆辭別母親回到北平。原來以為到了南京，隨時可以告假返家，誰知這竟是與母親最後一面，多少年來每想到此處，心中猶為之酸楚不已！

到了同和居，桂季垣已在一房間內坐候，見了他他就站起來打電話，不一會來了七、八個人，其中一人拿了一包法幣，說這是陳記者換的法幣八百萬元。我一算雖不是按着官定一比十三，但是比一比八市場比率多了好多，當時對桂季垣經理道謝外，並好生感激。到了南京，除去旅費與購置衣物外，手中還有七百多萬法幣，每天均帶在身邊，放在大衣口袋裡。

採訪部記者李朋，就是在臺北破獲的俄諜案主角，有一件大衣和我的一模一樣，均係購自天津國貨售品所。有一天，我要離開採訪部穿上大衣時，一摸口袋內七百萬法幣不翼而飛，口袋內雜物全非我所有，這才悟會到一定是李朋把大衣穿錯了，心中好生着急。於是我放棄外出，回頭

又坐在椅子上，等待李朋歸來，不一會李朋自外匆匆回來，他說你好有錢呀！七百萬法幣帶在身邊，也不怕被扒手扒去。李朋於是把錢連同大衣還給了我，由此看來李朋對金錢還非黑心之人，七百萬約等於那時三個月薪水，也並非小數目，但是他其後為什麼因為錢而落入德羅多夫圈套，而導致身敗名裂呢？

自此以後，我便與李朋經常沒事聊兩句，才知彼亦係河北人，且係北平燕京大學畢業，與家兄係同學，於是彼此以「老鄉」相稱，可以說相當熟悉了。其後我與編輯部譯電小姐王克慧，第一次去大華戲院看電影，暗中被李朋看個正着，事後他竟在社內大肆宣傳，使同事們跟着起鬧。因此，使我與王小姐在編輯部處境頗為尷尬，彼此見面均躲開，一時間都不好意思再來往，猶記看的那場電影是秦怡主演的「海茫茫」，是個悲劇，心中想難道是電影的兆頭不好？自此便與李朋心生芥蒂，見面連招呼都不打了。

果不然，惡運跟踪而來，國軍在徐州會戰失敗，大局逆轉，中央社精簡人事，王小姐便返回湖南寧鄉原籍。不久，我亦隨總社到了廣州，在廣州時彼此還通過通信，迫我飄洋過海來了臺灣，便斷絕一切來往了。

### 播遷羊城結伴觀光

在南京時，李朋在談到時局時，與一般人並無異常之處，有了問題就是到了廣州之後。民國卅八年初，行政院長孫科宣佈政府自南京撤往廣州，中央社獲得一列疏散專車，自南京撤往上海

，然後自上海乘飛機轉往廣州。我們係於卅八年二月四日（？）也，也就是陰曆卅七年的除夕十二月卅晚上，自南京下關車站啟程。下關車站中央社同事行李堆集如山，這時有一位同事也把行李拉到下關車站，拜託我和另一位同事替他行李帶到上海家中，他在南京新婚妻子家過完年，再自己搭車去上海。這位同事走後，有一位同事說，這真是豈有此理，我們這是逃難，許多東西都丟的丟扔的扔，現有的東西都拿不了，他舒舒服服在南京過年，東西卻讓別人替他受累，你們兩人不要管，誰也不要管，就讓這些行李扔在下關車站。

這位同事這麼登高一呼，所有同事包括另一位受託同事在內，大家都是老聖拉胡琴！自願自的把自己行李搬上車，就是有幫忙的，也是相對的彼此互相幫忙，你幫我抬，我幫你拉，這位同事行李誰也不理，只有我一人乾着急。在我想，彼此幫忙那不算幫忙，只有這種情形才算幫忙，可是堆行李的地方，距離上車的地方又遠，我拖了一件行李上車，還有好幾件，車站上亂哄哄，又怕被人偷走，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幸虧編輯部同事黃慶祥兄看不過去，下車來替我查看行李，他說：你慢慢拖別着急。最後一件則是由黃兄與我抬着上車。上車後看到另一位受託同事與幾個同事打橋牌消磨時光。到了上海，又是一番忙累，還是由黃慶祥兄幫忙，才搬到車站外，然後到了上海分社。黃慶祥兄來臺後，任聯合報副總編輯多年，現已退休移民澳洲去了。廣州這一帶，雖適值國破家亡，大家過着過一天算一天的生

活，內心裡充滿着隱憂，但是中央社同仁這時卻格外的團結與親熱，真如大家庭一般。我經常跟着編譯部副主任潘煥昆、編輯部副主任沈宗琳，或者與蔣星煜、戴潮聲、蕭同信等結伴暢遊黃花岡、紅花岡、荔枝灣、中山紀念堂、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王華樓等名勝之地。遊賞之餘，有時大家湊錢到「掛羊頭」去吃狗肉，或者到新陶芳去吃鹽焗鷄等，每天倒也樂陶陶，紓解了不少思家鄉、念父母的鄉愁！

在廣州，我與李朋雖仍時常見面，但從未與他結伴而遊；當然我對他宣揚王克慧小姐之事，仍然不太諒解。有一天，我正與同事們談國軍在青樹坪（？）還是鷄公山大捷時（？）李朋在旁邊說：「你還在作夢吧！還想國軍把八路打敗呀！那是不可能的，好好的自己打算打算吧！將來我們能保住小命就不錯了！」我沒有理他，李朋自己便走了。

政府自南京遷廣州時，曾通知各國駐華大使：「我政府遷往廣州，請各國駐華使節隨同前往，我政府願對交通工具予以協助與方便等。」各國駐華使節，包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內，均相應不理，只有蘇俄駐華大使潘友新（？）卻單槍匹馬的隨我政府到了廣州。這種情形，真使人對國際間政治的微妙，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天，採訪部記者蔣星煜說：有一個塔斯社俄國記者說在瀋陽認識你，問你是否還在瀋陽或者在什麼地方，他是從上海到廣州現任某某酒店。我一聽就知道是德羅多夫，但是我不想，在瀋

陽時我國為世界四大強國之一，國軍氣勢如虹，攻無不取，戰無不勝，與俄國人辯論辯論還有意思；而今，國事敗落如此，我何必去理一個俄國記者，談起話來，自己臉上也無光彩，所以懶得去理他，下了班還不如吃碗雲吞麵、睡大覺的好。李朋大概就在此時與德羅多夫搭上了線！

### 月入低微坐以待幣

廣州時期中央社的待遇實在太差，大家拿了薪水，趕快到街上去換港紙，大概每次最多換十幾元港紙，然後一元一元的換作爲每天吃早點及第粥，或者晚上吃雲吞麵之用。我記得那時想買一把洋傘，一問要五元港紙一把，把我嚇了一跳，買了傘就沒有錢吃早點了。不過，這時中央社有包伙制度很好，給同事們解決了吃飯問題，一切都是先吃飯，後扣錢，每月扣不了幾個錢。有的同事有一家數口，在社內包伙也扣不了幾個錢，全家老幼均可吃得飽飽的，這不得不感念蕭同茲社長這種由社內墊錢的包伙制度。

我這時在廣州寫信給自抗戰時期即天各一方的老父，請他自漢口迅速南下廣州，俾父子相依爲命，共度浩劫。父親在九一八事變時任遼寧高等法院通化第一分院院長，離開東北時立即向南京我國政府報告，政府不久即行改派爲湖北高等法院推事兼庭長與天門、滬水等地方法院院長。七七抗戰後，民國廿七年武漢即行陷落，以迄民國卅二年才重任河南潢川地方法院院長，勝利後出任鄭州地方法院院長。民國卅七年鄭州陷落，父親經信陽逃抵十年前舊遊之地的武漢，

接我從廣州的來信後覆函謂：「我在外飄蕩多年，與汝母亦已十餘年不見，況現已年老亟思返鄉，看來我父子已暫無緣相聚，祇好俟諸來日了，望吾兒一切珍重至盼。」誰知不久，白崇禧率大軍南撤，武漢即行淪陷，我亦自廣州乘執信輪，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在臺灣的高雄港登陸，迄今已逾卅五年，而與老父相別接近五十年了。

在廣州時，中央社同仁不知由誰發起，竟然來了一次「坐以待幣」行動，向蕭社長要求增加待遇。其理由爲，一個月薪水折合僅港幣十餘元，每天僅够吃頓早點，連買牙膏錢都沒有，怎麼行。當時的編輯部，由我編發C A P，汪廣雅兄譯電，另外還有二人，我已忘記是誰，共四人維持着工作。這時有人走進編輯部門口大喊，誰不參加「坐以待幣」就揍誰，將來爭取到錢也沒他的份。我於是站起把桌子一拍說：「想打架的就過來。」竟然被壓了下去。「坐以待幣」的結果，社中每人發了八十元港紙，大家有了錢，有的人買襯衣，有的人買鞋子，有的人去打牙祭吃一頓。這是民國卅八年四月的事，五月發多少就不得而知，因爲五月我在唐主任處得到暗示，社方將資遣大批人，有辦法的最好自己先想辦法，我就找了個藉口先行來臺。

來臺後進入工礦公司任職，奉派至該公司紡織分公司擔任秘書職務。我因爲對行政工作完全外行，一切均不習慣，深悔當時只憑剛自南京到達廣州的唐主任幾句話，便認定自己將被資遣，而倉促來臺之失計，心想爲什麼不等個水落石出

再來臺也不晚呀！因此，每天均在抑鬱中度過，其後得知到廣州的同事，如王繼樸、黃慶祥、蔣星煜、戴潮聲、龐文會、蕭同信、李朋、余滌之、齊振一等多人均被資遣，我這時始覺坦然，知道如留在廣州，也難逃被資遣的命運。

### 幫助李朋找回失金

有一天我正在臺北重慶南路一段一〇九號二樓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秘書室內悶坐無聊，忽然李朋來訪。他說：「老鄉你真有辦法，來臺灣居然找到這麼一個好位置，大家都羨慕你。」我說：「我真不能適應，幹着一點勁也沒有，也許不久我就重回中央社，跟着律主任到成都去。」李朋說：你別傻了，到了臺灣還要再到大陸去，你到了成都就不怕出不來嗎？談了一會，李朋才說：老鄉我有一件事，請你幫個忙，事情是這樣，我手中有一點錢，被人給偷走了，昨天已破案，錢在警察局一位警官手裡要幾天才能發還，麻煩你現在打一個電話，今天給我回來。我說：你別開玩笑，這又不是在瀋陽，不論我認識不認識警察局長戴鴻濤或者以後的毛文佐，我都可以拐彎抹角的給你要回來，現在我在臺北認識誰？我怎麼可以替你要回來！

李朋說：這位保存我錢的警官是你小同鄉，昨天他還問我認不認識你，只要你打個電話就行了。我一聽果然不錯，於是按着李朋告訴我的電話號碼，撥了一個電話，與這位警官接通。警官說，錢本來當天就可以還他，不過我們覺得李先生怎麼會有這麼多美鈔與黃金，有一點懷疑！好

啦！你就請李先生過來一趟，我在局裡等他，叫他拿回去就是了，這是我與李朋最後一次見面。

李朋失金案，就是由這位警官率人破獲，破的相當漂亮，其經過大略如次。李朋來臺後，即寄住一朋友家中，把手中黃金、美鈔，也交由朋友與其夫人保存。有一天他朋友說，家中遭小偷偷竊，其所存的黃金與美鈔亦不知去向。李朋當然很着急，尤其他的黃金係嵌在肥皂裡居然也會丟了，那真是不可思議，於是他就向警察局報了案。警察局乃指派這位警官偵辦此案，他率同員警進入李朋的朋友家中，環顧四周，並無外人進入與破壞的跡象，尤其門鎖完整如初，更令人覺得奇怪。他乃詢問小偷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為什麼一點也看不出來痕跡呢？屋主乃答稱，是由窗戶進來的，你們看窗外這條繩子已被弄斷了。這條繩子是我太太曬衣服用的，本來好好的，現在被小偷開窗戶時給弄斷了。警官一看，繩子的斷處整整齊齊，立刻明白是被人用剪刀剪斷，而不是被人拉斷的。警官隨即向大家宣佈說，這個竊案是內賊所為，繩子斷了是內賊故佈疑陣，因為這條細繩根本一拉就可拉斷，小偷何必用剪刀去剪斷，況且小偷也勿需帶着剪刀專門為剪繩子用！

警官乃命令隨同員警，在室內展開搜查，他本人則站在門口，觀察李朋寄居的朋友夫婦動靜。經過一番搜查，壁櫥、箱子、櫃子等處全看過了，均無所獲，但見這對夫婦還算沉得住氣，不過兩人不時交換眼色，向下面看一下，便立刻把視線移到他處。警官這時已猜得七、八分，賊物

大概是在榻榻米下邊，於是喝令把榻榻米全部翻過來查，別的地方不用再找啦！這對夫婦一聽要翻榻榻米，立刻面色大變，並且兩人一齊站在一個榻榻米上不肯離開。這位警官一看這情形，心中更有把握，於是命令先把這個榻榻米翻起來再說，如果沒有再翻別的，經過一陣推扯，才把這對夫婦推開，把榻榻米一翻，李朋的黃金與美鈔赫然出現。

據說，李朋的黃金不過十幾兩，美鈔亦不過千餘元，總合新臺幣不過十萬元左右，在今日民營企業高級職員的收入，最多不過一個月收入而已，可是在當年，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李朋俄謀案的被發現，是不是因為這個竊案，發現他手中有筆「鉅額」黃金與美鈔，而被治安機關懷疑，而予以注意才發現呢？還是他在其他地方有了漏洞，才被破案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 浩然集

喬家才著

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鐵血精忠傳」。「戴笠和他的同志」。「關山煙塵記」。「海隅叢談」四巨冊精裝合訂為「浩然集」一部定價臺幣捌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